

刑法与刑事辩护

业务资讯



2023 年 1 月

刑法与刑事辩护业务研究会

2023 年第 1 期 业务资讯

主 任：马 朗

副主任：寇树才

裴长利

王恩海

编 辑：欧阳晓滨

行业简讯

北京市检察机关发布类型化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

深化检律良性互动 凝聚法治建设合力——上海律协与市检察院召开
2022 年度调研座谈会

贵州高院发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判白皮书

新规速递

最高检印发《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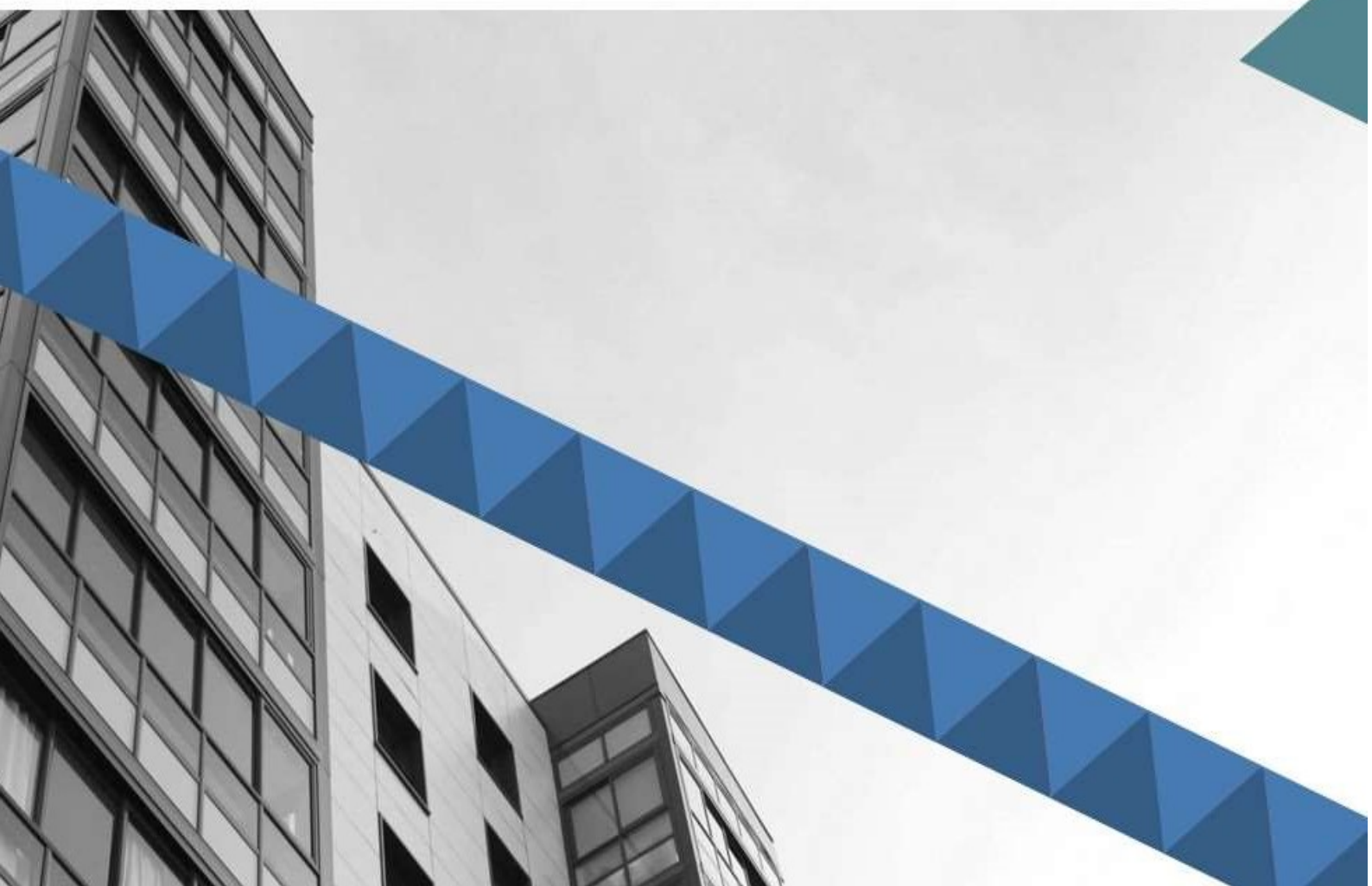
指导案例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 33 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食品安全执法司法
协作典型案例



行业简讯



北京市检察机关发布类型化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及市委实施意见，依法充分履行检察职能，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检察院在市工商联等单位的支持下凝聚多方合力，会同管委会各成员单位制定《关于建立北京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及两个配套规定，组建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库，目前4个分院、16个区院已实现合规办案“全覆盖”。为促进监督评估工作的科学开展，进一步提高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规范性、针对性、有效性，确保涉案企业“真整改”“真合规”，北京市检察院围绕“四个中心”“两区”建设要求，指导相关分院、基层院先后制发了知识产权、走私、串通投标、税收征管、证券期货等领域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细化类案验收标准，坚持因案施策、因企施策，确保合规整改成效。

市检三分院集中管辖全市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发布《证券期货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明确要求对于涉案企业内部可能扰乱资本市场秩序的经营管理行为，或者企业在市场交易及合作中可能存在的其他证券期货合规风险设立预警机制，助力涉案企业建立起针对性、预防性的合规管理制度。

市检四分院集中管辖北京海关缉私局侦查的走私犯罪案件，与北京海关联合发布《走私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对走私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计划、合规整改实施、合规整改评价标准及合规整改评价流程进行细化规范，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双向衔接，凝聚打击治理走私违法犯罪的合力。

朝阳区检察院以完善企业招标投标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漏洞为目标，与区工商联联合发布《串通投标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列明串通投标、商业贿赂等违规风险提示清单，助力企业建立健全招投标合规管理制度。

海淀区检察院为助力民营企业有效防范涉税风险，与区税务局、区工商联联合发布《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强化涉案企业对内部税务管理体系的“合规体检”义务，确保涉案企业建立起完善的税务管理制度，形成依法纳税的企业文化。

大兴区检察院立足服务保障科技创新引领区建设，与区知识产权局、区工商联联合发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构建知识产权专项合规要素评价体系，为实现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重要参考。

深化检律良性互动 凝聚法治建设合力——上海律协与市检察院召开 2022 年度调研座谈会

2022 近日，上海律协与市检察院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2022 年度调研座谈会，听取上海律师对上海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上海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盛勇强，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刘卫萍，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季诺，监事长张鹏峰等出席会议。会议由盛勇强副检察长主持。

会上，盛勇强副检察长从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保障大局、坚持司法为民、加强队伍建设四个方面通报了 2022 年上海市检察院重点工作情况。

与会律师围绕进一步健全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协作、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深化检律良性互动、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并对进一步推动完善律师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律师互联网阅卷试点、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盛勇强副检察长对律师界长期以来支持、配合和监督检查工作表示感谢，下一步将认真梳理研究与会律师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更好发挥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等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理论研讨、业务交流、同堂培训等，努力为律师营造更优执业环境，打造检律良性互动关系的“上海范本”，协力让法治成为上海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刘卫萍书记指出，检律双方凝聚共识、强化协作，多年来保持并不断完善常态化的沟通协同机制，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凝聚法治上海建设合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下一步要树牢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找准进一步加强检律协作的着力点，深化互动互信，维护司法权威，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法治需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季诺会长对上海检察机关长期以来对上海律师行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期待持续深化与检察机关的协作联动，加强机制共创、信息共享、队伍共建，充分发挥律师

在提升各项工作法治化水平中的独特作用，共同构建良性互动、规范有序的新时代检律关系，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

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张军英、第四检察部主任顾晓军、第六检察部主任陈子龙、研究室主任皇甫长城、案管办主任韩孔林、办公室副主任沈明、第八检察部副主任林仪明、第十检察部副主任邹先锋、第七检察部检察官赵蔚，上海律协副会长朱林海、陈峰、邹甫文、潘书鸿、曹志龙，副秘书长潘瑜、刑法与刑事辩护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马朗、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易国勇、刑诉法与刑事辩护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傅建平、刑事合规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顾伟等。

贵州高院发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判白皮书

12月14日，贵州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贵州高院新闻发言人、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张洪武发布了《贵州法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判白皮书（2020-2022）》。发布会上还发布了十个典型案例。

三年来，全省法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最高法院工作要求和省委、省委政法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在此基础上，贵州高院对近三年全省法院审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进行了梳理总结，深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特点及成因，分析审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难点，并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提出建议，以期能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法治贵州建设。

近三年，全省法院共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5854件9945人。总体上看，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数量逐年攀升，犯罪案件团伙化作案趋势明显，与2020年相比，2021年审结案件数量增长率高达446%，2022年前十个月审结的案件数量与2021年相比，增长了111.5%。在审结的案件中，涉及的罪名排前三的分别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诈骗罪。

从审结的案件看，犯罪分子的技术手段从最初的发送短信、拨打电话诈骗开始向互联网领域延伸。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也从最初谎称中奖、假冒熟人借钱等低端骗术向恋爱交友、网上购物、办理贷款等方向转移，涉及类型较多，且更迭较快，群众防不胜防。相比诈骗犯罪而言，上下游关联犯罪的表现形式相对较少，主要表现为向犯罪分子出售个人银行卡、微信号、企业对公账户和公民个人信息等。

据介绍，今年年初贵州高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三个工程”经验做法获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通过抓组织领导、抓案件审理、抓综合治理等方式最大限度压缩犯罪蔓延空间。

白皮书还深入探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兴起、蔓延的多方原因。一方面，从经济活动领域及其方式的改变、畸形消费观念和经济收入不均衡、特殊的区域位置为境内人员出境加入诈骗窝点提供便利，以及对新技术新业态的非法利用等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角度，探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兴起、蔓延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从电信网络设备设施和应用程序的监管、全民反诈意识的宣传引导以及行业、部门间协同治理等综合治理角度，探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全省法院将始终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综合治理工作，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的依法严惩高压态势，始终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统摄下的司法认定难题创新解决，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共治格局的纵深发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助力护好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法治贵州建设。

新规速递



最高检印发《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今天是第19个“国际反腐败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强调以“遏源”“断流”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举措，依法精准有力惩治行贿犯罪。

行贿犯罪是受贿犯罪的重要诱因，“围猎”腐蚀之风不刹，腐败增量难以有效遏制。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最高检第三检察厅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检察机关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办案质量不断提高，落实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决策部署的成效正在彰显。最高检印发《意见》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部署要求，结合办理行贿犯罪案件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各级检察机关立足职能从严惩治行贿、提升办案质效提供规范指引，助力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意见》强调，要准确领会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坚决落实反腐败斗争部署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担当履职，高度重视、积极履行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检察责任，以“遏源”“断流”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举措，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作出检察贡献。要落实工作要求，把握办案原则，做到惩治与预防相统筹、打击犯罪与促进经济发展相结合，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意见》强调，要坚持“一起查”的主基调，依法精准有力惩治行贿犯罪。要依法准确认定行贿犯罪，准确区分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对以单位名义实施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归个人所有的，应当认定为个人行贿。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行为单独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与行贿犯罪数罪并罚。要从严追究性质恶劣的行贿犯罪，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包括适用财产刑的建议，有力惩治行贿犯罪。要严格把握行贿犯罪的从宽

处理，认真审查从宽情节证据，区分不同的情形、程度，做到罪责相适、宽严得当。行贿人认罪认罚，可以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对涉行贿犯罪的企业，符合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监管条件的，要按照规定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并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严格督促企业合规整改，不认真落实整改的要依法提起公诉。要加大力度追缴和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通过认真审查、及时采取措施、探索建立机制、引入专业支持等，确保充分追缴和纠正。

《意见》要求，要依法适用强制措施，区分不同性质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要准确适用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对于符合相关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对用于生产经营的账户、设备等，一般不予查封、扣押、冻结，切实保障企业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

《意见》要求，要加强业务指导，做实配合制约。要严格执行行贿案件不起诉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的规定，并层报最高检备案，上级检察院要做好个案指导和综合分析研判。要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落实好办案衔接规定，确保配合有力、制约有效，促进凝聚共识、协同发力。要加强对行贿犯罪案件的审判监督，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监督效果。

《意见》指出，要强化诉源治理，推动标本兼治。要促进提升行贿犯罪治理效能，强化数字检察理念，分析研判相关行贿犯罪的规律特点和背后的管理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或者专项报告。要加强预防行贿法治宣传，揭露行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释放坚决惩治行贿的强烈信号，彰显坚决追缴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鲜明态度，促进形成杜绝行贿、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22年9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5次会议、2022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12月19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现就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一）以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二）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

（三）其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情形。

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不排除或者故意掩盖重大事故隐患，组织他人作业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冒险组织作业”。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第三条 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拒不执行”：

（一）无正当理由故意不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二）虚构重大事故隐患已经排除的事实，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三）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认定是否属于“拒不执行”，应当综合考虑行政决定、命令是否具有法律、行政法规等依据，行政决定、命令的内容和期限要求是否明确、合理，行为人是否具有按照要求执行的能力等因素进行判断。

第四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重大事故隐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标准以及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认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的“危险物品”，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确定。

对于是否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危险物品”难以确定的，可以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地市级以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第五条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情形之一，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等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犯罪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提供的证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证明文件”：

（一）故意伪造的；

（二）在周边环境、主要建（构）筑物、工艺、装置、设备设施等重要内容上弄虚作假，导致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影响评价结论的；

（三）隐瞒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及整改落实情况、主要灾害等级等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四）伪造、篡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信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影响评价结论的；

（五）故意采用存疑的第三方证明材料、监测检验报告，影响评价结论的；

（六）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影响评价结论的情形。

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材料、影响评价结论，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对评价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无主观故意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有本条第二款情形，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违法所得数额十万元以上的；

（四）两年内因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有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行为，在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小及其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第八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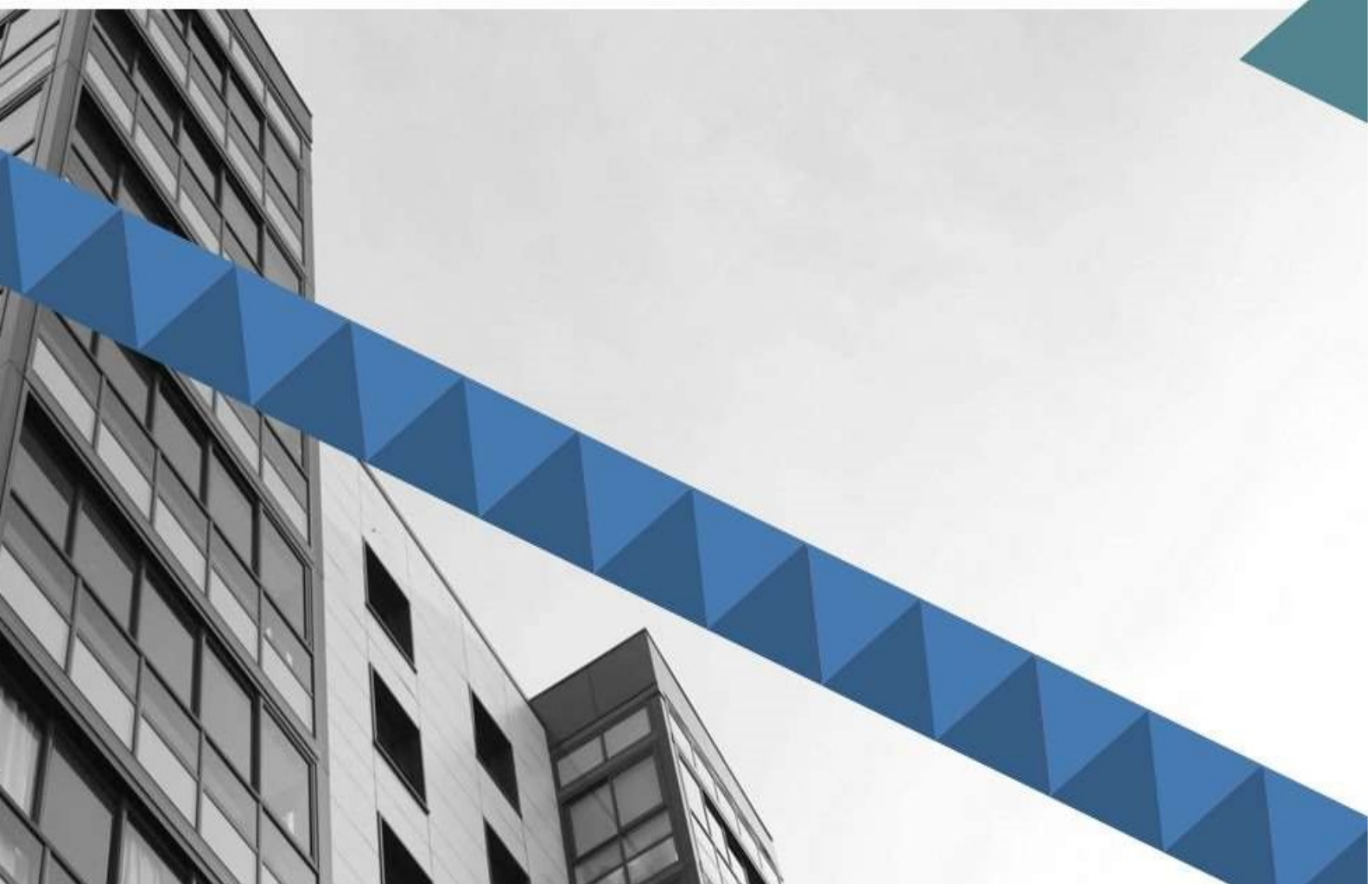
第九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该中介组织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条 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行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采取措施排除事故隐患，确有悔改表现，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予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十一条 有本解释规定的行为，被不予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22年12月19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指导案例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 33 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龚品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三个案例（指导案例 186-188 号），作为第 33 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2 年 11 月 29 日

指导案例 186 号 龚品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为特征/软暴力

裁判要点

犯罪组织以其势力、影响和暴力手段的现实可能性为依托，有组织地长期采用多种“软暴力”手段实施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辅之以“硬暴力”，“软暴力”有向“硬暴力”转化的现实可能性，足以使群众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并已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应认定该犯罪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

基本案情

2013年以来，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在江苏省常熟市从事开设赌场、高利放贷活动，并主动结识社会闲杂人员，逐渐积累经济实力。2014年7月起，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组织被告人马海波、赵杰、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等人，形成了以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为首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并于2015年4月实施了首次有组织犯罪。2016年下半年、2017年8月梁立志、崔海华先后加入该组织。

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被告人龚品文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刘海涛为该组织的领导者，被告人马海波、赵杰、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等人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崔海华、梁立志等人为一般成员。该组织内分工明确，龚品文、刘海涛负责决策和指挥整个组织的运转；被告人马海波、赵杰、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受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的指派开设赌场牟取利益，并在赌场内抽取“庄风款”“放水”、记账，按照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的指派为讨债而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崔海华、梁立志参与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该组织为规避侦查，强化管理，维护自身利益，逐步形成了“红钱按比例分配”“放贷本息如实上报，不得做手脚”等不成文的规约，对成员的行动进行约束。在借款时使用同伙名义，资金出借时留下痕迹，讨债时规避法律。建立奖惩制度，讨债积极者予以奖励，讨债不积极者予以训斥。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实施开设赌场、高利放贷等违法手段聚敛资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中，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非法获利的金额仅查实的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另，在上述被告人处搜查到放贷借条金额高达人民币4000余万元，资金流水人民币上亿元。该组织以非法聚敛的财产用于支持违法犯罪活动，或为违法犯罪活动“善后”，如购买GPS等装备、赔付因讨债而砸坏的物品，以及支付被刑事拘留后聘请律师的费用。该组织为维护其非法利益，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长期实施多种“软暴力”行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社会治

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在江苏省常熟市及周边地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为寻求建立稳定犯罪组织，牟取高额非法利益而实施大量违法犯罪活动。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一）开设赌场罪

2015年4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马海波、王海东、赵杰、王德运、陈春雷多次伙同他人在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辛庄镇等地开设赌场，仅查明的非法获利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

（二）寻衅滋事罪

2014年至2018年，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伙同其他被告人，在江苏省常熟市原虞山镇、梅李镇、辛庄镇等多地，发放年息84%-360%的高利贷，并为索要所谓“利息”，有组织地对被害人及其亲属采取拦截、辱骂、言语威胁、砸玻璃、在被害人住所喷漆、拉横幅等方式进行滋事，共计56起120余次。

（三）非法拘禁罪

2015年至2016年，被告人龚品文、刘海涛、马海波、王海东、赵杰、王德运、陈春雷在江苏省常熟市等多地，为索要高利贷等目的非法拘禁他人10起，其中对部分被害人实施辱骂、泼水、打砸物品等行为。

（四）强迫交易罪

1. 2013年3月，被告人龚品文向胡某某发放高利贷，张某某担保。为索要高利贷本金及利息，在非法拘禁被害人后，被告人龚品文强迫被害人张某某到王某某家提供家政服务长达一年有余，被告人龚品文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25500元。

2. 2014年11月，被告人刘海涛、王海东向陈某某发放高利贷，陶某某担保。在多次进行滋事后，被告人王海东、刘海涛强迫被害人陶某某于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到被告人住处提供约定价值人民币6000余元的家政服务共计80余次。

（五）敲诈勒索罪

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1月21日，被告人刘海涛、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实施敲诈勒索3起，以签订“车辆抵押合同”、安装GPS的方式，与被害人签订高出实际出借资金的借条并制造相应的资金走账流水，通过拖走车辆等方式对被害人进行要挟，并非法获利合计人民币5.83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苏0581刑初112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龚品文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认定被告人刘海涛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对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亦判处了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龚品文、刘海涛等人提出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苏05刑终10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组织特征。一是该犯罪组织的成长轨迹明确。龚品文与刘海涛二人于2007年左右先后至江苏省常熟市打工，后龚品文从少量资金起步，与刘海涛等人合作开设赌场并放高利贷，逐步积累经济实力，后其他组织成员相继加入，参股放贷。在高利

放贷过程中，因互相占股分利，组织成员利益相互交织，关系日趋紧密，架构不断成熟，并最终形成了以龚品文为组织者、领导者，刘海涛为领导者，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马海波、赵杰为积极参加者，崔海华、梁立志为一般参加者的较稳定的违法犯罪组织。二是该犯罪组织的行为方式和组织意图明确，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和高利放贷聚敛非法财富，在讨债过程中，以滋扰纠缠、打砸恐吓、出场摆势、言语威胁、围堵拦截等“软暴力”方式为惯常行为手段，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目的是实现非法债权，意图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由于组织成员系互相占股出资及分利，故无论组织中哪些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相关非法利益的实现均惠及全体出资的组织成员，符合组织利益及组织意图，为组织不断扩大非法放贷规模，增强犯罪能力等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创造条件。三是该犯罪组织的层级结构明确，该组织以龚品文、刘海涛为基础，龚品文吸收发展马海波、赵杰，刘海涛吸收发展王海东、王德运、陈春雷，形成二元层级关系，各被告人对所谓“替谁帮忙、找谁商量”均有明确认识。在具体违法犯罪活动中，以共同开设赌场并非法放贷为标志，两股势力由合作进而汇流，互相占股出资放贷，共同违法犯罪讨债，后期又吸收崔海华、梁立志加入，形成三元层级结构。在组织架构中，组织、领导者非常明显，积极参加者和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人员规模逐渐增大，且本案后续所涉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犯罪均是由这些组织成员所为。四是该犯罪组织的行为规则明确，组织成员均接受并认同出资后按比例记公账分利、讨债时替组织出头等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有组织成员供述，也与组织的实际运作模式和实际违法犯罪活动情况相吻合，相关行事规则为纠合组织成员，形成共同利益，保持组织正常运转起到重要作用。综上，该组织有一定规模，人员基本稳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固定，内部层次分明，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二）关于经济特征。一是该犯罪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快速聚敛经济利益。该组织以开设赌场、非法高利放贷为基础和资金来源，通过大量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保障非法债权实现，大量攫取非法经济利益。其中，开设赌场并实施非法高利放贷部分，有据可查的非法获利金额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且大部分被继续用于

非法放贷。在案查获的部分放贷单据显示该组织放贷规模已达人民币4000余万元，查实银行资金流水已过亿元，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二是该犯罪组织以经济实力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该组织获得的经济利益部分用于支持为组织利益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该组织经济利益的获取过程也是强化组织架构的过程。综上，该组织聚敛大量钱财，又继续用于维系和强化组织生存发展，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三）关于行为特征。该组织为争取、维护组织及组织成员的经济利益，利用组织势力和形成的便利条件，有组织地多次实施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不同类型的违法犯罪活动，违法犯罪手段以“软暴力”为主，并体现出明显的组织化特点，多人出场摆势、分工配合，并以“硬暴力”为依托，实施多种“软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软硬暴力行为交织，“软暴力”可随时向“硬暴力”转化。这些行为系相关组织成员为确立强势地位、实现非法债权、牟取不法利益、按照组织惯常的行为模式与手段实施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符合组织利益，体现组织意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明显。

（四）关于危害性特征。该犯罪组织通过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在社会秩序层面上，该犯罪组织长期实施开设赌场、非法放贷，“软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范围波及江苏省常熟市多个街道，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给部分被害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严重破坏，给部分被害人所在机关学校的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带来严重冲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败坏社会风气，冲击治安秩序，严重降低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影响十分恶劣。在管理秩序层面上，该犯罪组织刻意逃避公安机关的管理、整治和打击，破坏了正常社会管理秩序。在社会影响层面上，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在一定区域内致使多名群众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从在案证据证明的群众切身感受看，群众普遍感觉心里恐慌，安全感下降，群众普遍要求进行整治，恢复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综上所述，本案犯罪组织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标准。该组织已经形成了“以黑养黑”的组织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使该组织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共同犯罪和恶势力犯罪集

团。龚品文犯罪组织虽然未发现“保护伞”，但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使当地群众产生心理恐惧和不安全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对黑社会组织的认定，不能仅根据一个或数个孤立事实来认定，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事实来反映。因为以“软暴力”为手段的行为通常不是实施一次就能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其单个的行为通常因为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后果不严重而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不能认定为犯罪，此时必须综合考虑“软暴力”行为的长期性、多样性来判断其社会影响及是否构成黑恶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性特征所要求的“造成重大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非个别的、一时的，特别是在以“软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犯罪组织中，要结合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时间跨度、性质、后果、侵害对象的个数、是否有向“硬暴力”转化的现实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群众安全感是否下降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局限在必须要求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都要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也不能简单地以当地普通群众不知晓、非法控制不明显等，认为其危害性不严重。从本案中被告人非法放贷后通过“软暴力”讨债造成的被害人及其家庭、单位所受的具体影响和周边群众的切身感受等来看，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构成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秀康、沈丽、王江）

指导案例 187 号 吴强等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集团/公然性

裁判要点

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应当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其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公然性，且手段应具有较严重的强迫性、压制性。普通犯罪集团实施犯罪活动如仅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缺乏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意图，在行为方式的公然性、犯罪手段的强迫压制程度等方面与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区别，可按犯罪集团处理，但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初，被告人吴强、季少廷为牟取不法利益，与被告人曹兵共同商定，通过约熟人吃饭时“劝酒”，诱使被害人酒后驾驶机动车，而后再制造交通事故，以被害人系酒后驾驶机动车欲报警相要挟，索要他人钱财。后被告人曹静怡、李颖明知被告人吴强等人欲实施上述违法犯罪活动而积极加入。并在被告人吴强、季少廷的组织、安排下，逐步形成相对稳定、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开始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在实施违法犯罪过程中，为了增加人手，被告人吴强又通过被告人邵添麒将季某某、徐某某（均系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带入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2017年2月底至3月初，季某某、徐某某随被告人吴强共同居住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租住地，并由吴强负责二人的起居、生活及日常开销。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以吴强为首的犯罪集团，其中吴强为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季少廷及季某某、徐某某为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被告人曹静怡、李颖、邵添麒等人为该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告人季凯文、曹立强、姜东东、曹兵以及应某某（未成年人，另案处理）、邱某某（另案处理）为该犯罪集团的积极参加者。期间，吴强纠集季少廷、曹静怡、李颖、邵添麒、曹兵以及季某某、徐某某等人，以威胁、恐吓等手段，先后五次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后吴强发现赌场内的流动资金较多，且参与赌博人员害怕

处理一般不敢报警，遂又纠集季凯文、曹立强、姜东东及季某某、徐某某、应某某等人持气手枪、管制刀具、电棍等，采用暴力手段实施抢劫。

2017年12月，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强等人犯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向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理中，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追加起诉吴强犯故意伤害罪，同时追加认定本案是以吴强为首带有恶势力性质的犯罪集团。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7）苏0612刑初83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对本案其他被告人亦判处了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吴强、季少廷、曹静怡、李颖、邵添麒、季凯文、姜东东、曹立强、曹兵等人与另案处理的季某某、徐某某、应某某等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期间采取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且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目的明确、分工明细，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可以认定为犯罪集团。

被告人吴强组织、领导该犯罪集团实施一系列犯罪活动，是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季少廷及季某某、徐某某等人参与谋划被告人吴强组织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或抢劫犯罪，是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被告人曹静怡、李颖多次积极参与该犯罪集团的敲诈勒索犯罪活动，被告人邵添麒将平时跟随其的未成年人季某某、徐某某介绍给被

告人吴强，并同意让季某某、徐某某加入该犯罪集团，且其本人也亲自参与该犯罪集团的敲诈勒索犯罪活动，上述被告人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告人季凯文、曹立强、姜东东、曹兵以及未成年人应某某明知被告人吴强为首的犯罪集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积极参与商量、实施，上述被告人是该犯罪集团的积极参加者。对公诉机关指控本案属犯罪集团，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被告人吴强等人实施的犯罪活动明显是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但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进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意图。在敲诈勒索犯罪中，被告人吴强等人的主要犯罪手段是约熟人吃饭，设局“劝酒”造成被害人酒后驾车，再制造交通事故，进而以报警相要挟，通过所谓的“协商”实现对被害人财物的非法占有。吴强等人在单纯“谋财”意图的支配下实施敲诈勒索、抢劫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尚不明显，犯罪手段、行为方式与典型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明显差异，实际所侵犯的法益也基本集中在公民财产权利方面。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其特征表现为：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本案被告人系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关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应符合“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的认定要求，本案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应按一般犯罪集团对各被告人定罪量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振男、金永南、施玉萍）

指导案例 188 号 史广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诉讼/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涉案财物权属/案外人

裁判要点

在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审理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进行调查，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其意见，确有必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其出庭，以查明相关财物权属。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4 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史广振 2007 年 12 月即开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014 年以来，被告人史广振、赵振、付利刚等人先后实施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非法拘禁，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查扣史广振前妻王某某房产一套及王某某出售其名下路虎越野车所得车款 60 万元，另查扣王某某工商银行卡一张，冻结存款 2221 元。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王某某就扣押财物权属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审理期间，人民法院通知王某某出庭。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史广振与王某某 2012 年 9 月结婚。2013 年 7 月，王某某在河南省焦作市购置房产一处，现由王某某及其父母、女儿居住；2014 年 2 月，史广振、王某某以王某某名义购买路虎越野车一辆；另扣押王某某工商银行卡一张，冻结存款 2221 元。2014 年 12 月，史广振与王某某协议离婚，案涉房产、路虎越野车归王某某所有。路虎越野车已被王某某处分，得款 60 万元，现已查扣在案。

裁判结果

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2018）豫 0821 刑初 331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史广振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含路虎越野车的全部卖车款 60 万元及王某某银行卡存款 2221 元）。本案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至有期徒刑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宣判后，史广振、赵振、付利刚等被告人提出上诉，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作出（2019）豫 08 刑终 68 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史广振、赵振、付利刚等人的行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

被告人史广振前妻王某某名下的路虎越野车系史广振与王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但史广振与王某某均无正当职业，以二人合法收入无力承担路虎越野车的购置费用。史广振因被网上追逃无法办理银行卡，其一直使用王某某的银行卡，该卡流水显示有大量资金进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购置路虎越野车的费用及该银行卡中剩余钱款均属于违法所得，故已查扣的卖车款 60 万元及银行卡中剩余钱款均应当予以没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蔡有安、徐利民、蒋扬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食品安全执法司法协作

典型案例

案例1 陈某、沈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被告人陈某于2013年在外省某地成立某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各类调味品。2017年底至案发，陈某为降低生产成本，违反企业生产标准，在生产白胡椒粉产品过程中，要求工人在产品中掺入大米粉、辣椒粉等原料，并将该劣质白胡椒粉成品销售至全国多地。被告人沈某受陈某雇佣，从事原材料采购、成本核算、安排生产等工作，协助陈某实施上述掺杂掺假活动。至案发，涉案劣质白胡椒粉产品的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39万余元。

2020年10月28日，该案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挂牌督办。2020年11月27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陈某、沈某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3月22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陈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沈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陈某、沈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该案是本市检察机关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协作工作机制，准确、有效打击调味品领域制假售假的典型案例。判决生效后，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对销售涉案伪劣白胡椒粉产品的企业及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确保行刑惩治形成闭环，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

案例2 罗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被告人罗某在本市从事肉制品零售经营，2020年起，罗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大量批发成品鸭脯肉卷，并将鸭脯肉卷冒充为肥牛卷，销售至本市几家餐饮机构。2021年3月，本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罗某的上述行为，当场查获涉案“肥牛卷”44袋，经检测未检出牛源性成分，仅检出鸭源性成分，查明系使用鸭肉卷冒充。至案发，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2万余元。

2022年3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罗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6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罗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罗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本案违法犯罪线索后，依托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同步引导取证，确保刑事犯罪及时、有效被查处。

案例3 马某甲、马某乙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2020年起，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明知从他人处批发的减肥咖啡被食用后会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的情况下，仍通过网络进货后再借助网络渠道销售至全国各地，查明的销售金额不少于人民币2万余元。案发后，行政执法人员、公安人员从马某甲处查获到部分涉案减肥咖啡。经检测，涉案减肥咖啡检出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生产中添加的西布曲明成分。

2022年6月16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马某甲、马某乙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2022年7月8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马某甲、马某乙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马某甲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马某乙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本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群众举报后，迅速开展调查工作，发现涉嫌犯罪后，立即依托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抄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即时介入侦查，开展犯罪线索深挖，协同公安机关抓获5名处于上下游犯罪链的不法分子，彻底捣毁涉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减肥产品非法利益链条，有力净化网络销售环境，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案例4 许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被告人许某在本市某菜场租赁摊位经营海鲜水产，在贩卖小黄鱼的过程中，明知不得对小黄鱼进行人工染色，但为提升小黄鱼外观鲜度、促进销量，仍使用“黄粉”溶液对小黄鱼进行浸泡染色，并对外出售，谋取非法利益。2022年1月，行政执法人员、公安人员在许某摊位查获染色用“黄粉”、“黄粉”溶液，以及染色小黄鱼6千克，经检测检出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生产中添加的碱性橙Ⅱ成分。

2022年6月29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许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2022年7月29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以许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许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依托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发现本案线索后，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加强协作，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等工作，全面查明涉案事实，进一步查证“黄粉”来源，开展全链条打击。